

凤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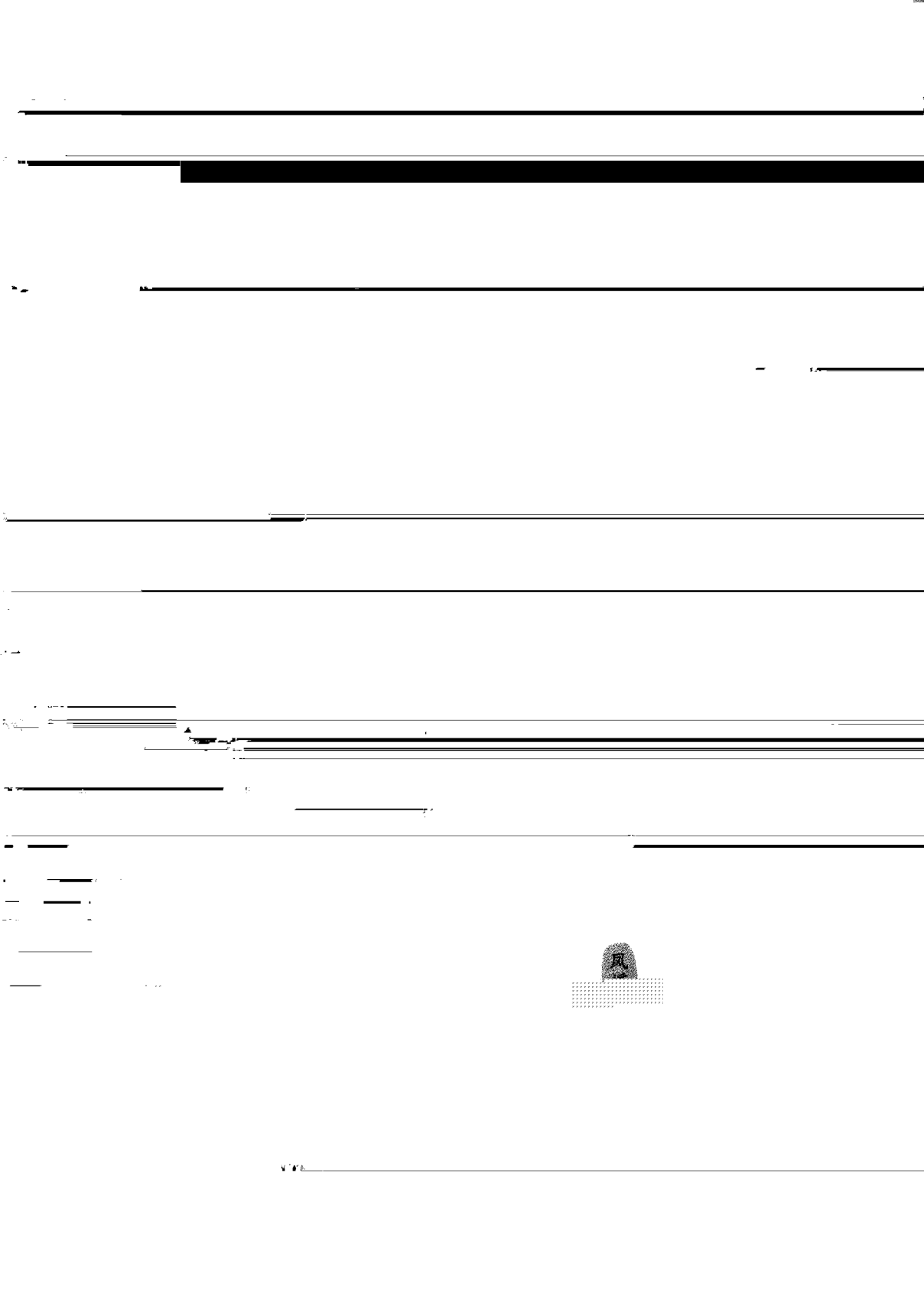
江南

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

「江南」，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充满了诗意和想象的文学资源。当历史的脚步踏入二十世纪，「江南」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又呈现出怎样复杂的关联？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南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凤媛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5039 - 3587 - 9

I. 江… II. 凤… III. 华东地区—文化史—关系—现代
文学—中国 IV. I206.6 K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4775 号

江南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

著 者 凤 媛

责任编辑 胡 晋

责任校对 方玉菊

装帧设计 玲 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587 - 9/I · 1631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序

吴福辉

我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本无师生之谊，可是因为某种因缘，却渐渐搭起了这样一座类似（当然不完全是）的平台和桥梁。自己也觉得是人世间诡谲莫测的事情。现在该校出身的凤媛的博士论文将要成书了，这是很自然、很可喜的。我一听此题就觉亲切，因为我的原籍本在浙东，出生又在苏南，从小夏日里乘凉就听惯听熟大人们讲什么唐伯虎、徐文长的故事，耳濡目染，时时领略着这块土地散发的情色智慧的柔美氛围，后来离开了，禁不住静夜想念。似乎比凤媛的皖籍更接近“江南”。如要谈及典型文学与典型文化的联结，我也算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一个，对谁是最典型的江南作家很感兴味，对现代江南中的浙籍S会馆作家与“五四”的关系、与左翼的关系，苏南籍作家和南社、鸳鸯蝴蝶派的关系，江浙作家和海派甚至京派的关系，江南文化资源下上海作家的人格、心理、风度等等也都有浓厚的兴味。在阅读凤媛论文的过程中，因为这种原因，我经常不自主地发出会心的微笑。这也是我所以答应写这篇序言的理由吧。

江南文化的研究，自来较热，于今为烈。我知道的国内新成立的江南文化研究机构，就有好多个。地域性的文化会造成文学的特殊人才，使得文学增添个性，这也属常识。现代文学除了京沪两地，江浙、四川、湖南、东北，都可称是文学“大户”、“大省”，历来受到不少学者的注目。凤媛的研究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破土而出，这并不容易。但我觉得她往前走了一小步（一小步就是一小步。不必往一小步等于一大步那句惊世名言或是现今快要沦为广告用语上面，去发生联想）。主要便是在“江南诗性文化”这片园林中，能够不慌不忙地做些深耕细作，加以扩充，理清流变，提炼新质。我所说的一小步，不必夸大，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诗性文化内

里的“商性”，被从来没有那么正面地得到阐发了。“正面”，不仅是指正面的正面，还包括不回避、不曲解，是属于直面地、正正当地进行分析，连同由此衍生的一切问题。这是新质之一。还有提出了江南的“刚性”，也很新鲜，让人想到鲁迅赞美过的台州人的“硬气”，浙东人的粗犷豪强，绍兴目连戏人物“女吊”和“无常”的刚烈，《铸剑》中“黑色人”的复仇反抗精神等。连原籍宁波的苏青，都有人称为“仔细想起来却是结实的真实”（张爱玲语）。这是对“江南诗性文化”的补充。

再加上“趣味”、“情色”、“智性”，在此五大深化了的江南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作者企图建立起中国现代江南籍作家和江南表达的宏大文学圈，就比较有血有肉，比较有新意了。接着，作者联系着这种文化，紧紧扣住典型作家和作家的典型文学现象铺陈开来，让我们仿佛见到了一片熟悉的却又有陌生感的文学天地。在“趣味”一题下，由周作人、俞平伯读到汪曾祺的时候，就感有味道。特别是解析汪曾祺的“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这是江南风格的谐趣，绝对的与西南边陲的麻辣豪爽不同，也与东北二人转的调笑放浪相异。汪曾祺他自己就分析过自己的嘲谑，道“人到了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鲁迅说金圣叹‘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鲁迅没有被杀过头，也没有当过右派，他没有这种体验”。这话已经是幽默。论及江南文化对作家各自的影响，在情色方面，“较之别的江南作家更专情于‘女色’描写的趋向，郁达夫呈现出了一个‘水样的男子’的独特‘男色’”，这也有了不同于一般讲述郁达夫的声音。而在谈到朱自清、卞之琳这样的长久生活在北地的文学家的江南情思的时候，我一方面感受到对朱、卞两位有了新的感受，同时取得了某种共鸣。我也是这样呀，好像我自己的某些素质与这些作家相通，他中有我，我中有他了。读论文而发生共鸣，应当是难得的体验。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将现代文学置于近代以来中国乡土文化、城镇文化、都市文化的胶合状态中来进行考察。这是江南文化的特质，或许作者还没有充分意识得到。在现代中国，只有沿海文化才有可能将此三者（包括它们之间的冲突）融于一炉，炼出新的文化仙丹来。三种文化的杂交，远比不能杂交的文化有力量，有后劲儿。其中间项即对江南城镇的理解，正是城镇人汪曾祺、叶兆言、苏童之所以能成为作家汪曾祺、叶兆言、苏

童的缘故。胶合和渗透，是江南文化内部的现代状。完全隔绝已不可能，“流动”才是江南活力所在。有乡土、城镇、都市之间的流动，也有浙东、浙西的流动，南方对北方的流动。后者的典型例子，便是京派差不多都是江浙人。当初钱钟书就看出了这一点，曾调侃说京派多半不是北京人，但谈起北京就如归化的犹太人谈自己归化了的国家，一样情深。这似乎已经超脱了江南文化，却是更能加深对江南的认识的。而近代上海文化的勃兴来源于苏、浙为中心的江南腹地经济、人力的支持，这种渗透尤其鲜明，是了解江南和上海的一个关键。书中特别提出苏州移向上海，要弱于浙江的一点，颇能说明问题。这里有醒目的数字，如为上海经济提供资本保障的江南金融业，在上海钱庄的九大家族中，浙江占7家，苏州占2家，并没有上海本家，均来源于江南；15位钱庄的主要投资人，浙江10人，江苏3人，安徽1人，上海本地仅1人。明清以降，苏州从原是扬州之后中国最大的通商城市，渐次跌落。上海的四马路在晚清刚刚繁荣，被人叫做“小苏州”；顷刻之间，苏州变成了“小上海”：所以它有包袱。浙江入沪，包袱就小些，人口和财力的涌入反而大些。这一切，如果没有对江南文化内部的深入了解，是不可能谈得如此细腻的。从凤媛的实际情况来看，她若把江南研究长期进行下去，可以在江南的城乡之间不断地游荡。不要专做城镇，也不要专做都市，应由本文出发去探视前面有没有新路。

本书的写法目前是由文化而文学的。在方法上依仗着对“江南诗性文化”的不断开发，找出典型作家来相印证。尽管典型作家的选择颇有眼光、有尺度，与文化阐释可以相得益彰，但“印证”的气味仍然很难摆脱。我曾经设想，不像现在采用的由文化而文学那么一套分析方式，反过来，采用反向的思路，从文学中先提出问题，来论述江南文化对创作文学、组织文学、运用文学所起的作用。比如从现代文学中提炼出“小桥流水般的跃动描写与曲曲折折”（与沈从文的湘西叙述和水的关系当然相区别），提炼出“男女欢爱的温存与千回百转”（当然不是高密东北乡爱情那般的轰轰烈烈），和“异地的开放的江南思绪丝丝相连”（不是封闭到为自己绣一辈子嫁妆的果园城小姐的闺房思念）之类，然后由文学而江南文化，去谈两者复杂丰饶的关联。或者，兼收并蓄，原来这两式就可以同时被容纳到本书之内？这是我的一点参考意见而已。

执笔此文，我人在青岛。在京的时候，写作计划本来已经列在六月份

的纸头上，但为了招生、答辩，为了参加学生的毕业典礼，出席几位师辈的学术研讨会，我一连出门数次，耽搁了下来。七月的今天，我安坐在中国海洋大学浮山校区 54 号五楼的窗前，抬头越过别人家的红屋顶望得见浩瀚的黄海，低头见我电脑上行将写毕的序文。外面的雨丝纷纷落下，一忽儿晴，一忽儿阴，再过一刻，太阳露出了脸，光色柔和，凉风习习，使人浮想联翩。青岛不是江南，但 1930 年代这里曾经是很多京派作家的客居之地。而京派不是与江浙文人、江南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吗？今夕何夕，我敲下了本文最末一个字。

2008 年 7 月 20 日中午，于青岛雨后新晴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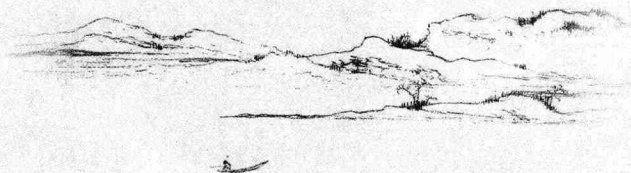
序	吴福辉 (001)
绪论：能不忆江南？	
——江南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意义及研究概况	(001)
第一章 江南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	
第一节 “江南”、“江南文化”之辨	(021)
第二节 江南文化对现代文学的渗透	(023)
第三节 江南文化与现代文学的互动	(032)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的江南趣味之维	
第一节 兼容雅俗的中庸之趣	(044)
第二节 诗酒人生的古典之趣	(051)
第三节 悲悯作底的嘲谑之趣	(057)
第三章 中国现代文学的江南情色之维	
第一节 “水样的男子”	(081)
第二节 “花样的女子”	(093)
第三节 从“红粉”到“碧奴”	(099)
第四章 中国现代文学的江南智性之维	
第一节 写实者的“刹那”“直觉”	(126)
第二节 “相对”论者的智慧	(135)
第三节 秦淮说书人的“心机”	(140)

第五章 中国现代文学的江南商业之维	(175)
第一节 社会剖析者的商人书写	(182)
第二节 置身商海的乡土抒情	(192)
第三节 商业作家的私人写作	(201)
第六章 中国现代文学的江南刚性之维	(209)
第一节 “力之美”的审美追求	(212)
第二节 “戛剑生”的复仇哲学	(217)
第三节 “地之子”的艺术思维	(227)
结语：记忆江南之外	(241)
参考文献	(246)
后记	(257)

绪论：

能不忆江南？

——江南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意义及研究概况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唐）白居易《忆江南》

“江南”，显然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所指。它既是一个静态的地理概念，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范畴；它既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现实区域，也是精神意识层面上的一种文化符号，其丰厚的内蕴涉及到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诸多人文领域，包含了多重的语义空间。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充满了诗意和想象的文学资源，“能不忆江南”的喟叹和感慨一直伴随了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的精神之旅，而当历史的脚步迈入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茅盾、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施蛰存、穆时英、苏青、艾青，及至当代的汪曾祺、苏童、叶兆言、曹文轩、余秋雨……这些现当代江南作家的齐集和接续出现，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态发生的重要影响，则更加凸现出“江南”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密切关联。本论文进入的正是“江南”这样一个现实的空间范围和丰富的“语义场”，试图研究的也是由这样一个地区所生成的地域文化——江南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

003

一 研究意义

选择这样的研究命题有着多重意义。从大的范围来看，这是一次试图在文化和文学之间搭建联系和桥梁的努力。从文化的范畴去寻找文学之所以如此的依据，同时，也从文学的形态中找到文化之所以如此的原因。这种双向互动的研究模式，既能够避免单纯文化研究的空泛和过于理论化，也可以开拓出文学研究的又一种新的维度。

再来落实到本论文的具体研究对象“江南文化”。它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范畴，正如同我们通常所说的“巴蜀文化”、“湖湘文化”、“东北文化”一样，属于中国地域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较之于其他地域文化，以

江、浙地区为中心的“江南文化”显然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从中国几千年来文化发展的整体格局来看。中国文化历来就有南北方文化之别。依托于黄河文明发展起来的北方文化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发生发展的源头。而围绕着长江流域成长起来的南方文化则一直被认为是黄河文明的衍生物，并被排斥在主流文化的范畴以外。这种论断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考古学家对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掘才开始有所动摇。他们在距今约7000年的第四文化层内发现了大量的稻谷遗物和木建筑构件，以及精致的象牙器和漆器等遗物^①，正说明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这让此前一直漠视长江文明存在的众多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开始将目光投之于依托长江文明成长起来的南方文化。所以，我们对于江南文化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在引入了和北方文化的对比框架之后，这种研究将成为对中国南北方文化格局及其文化特征的一次重新审视和认知，也为中国文化今后的发展路径和取向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其次，从当下地域文化的研究热点来看。学界纷纷瞩目于有着强劲经济依托的海派文化，关注到它所包含的现代性质素和都市文化的内涵，关注到它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先锋性意义，但往往却忽略了处在海派文化腹地的江南文化。事实上，无论是从经济实力的发展，还是文化风气的形成，江、浙地区都是海派文化得以发生、发展以至成熟的最为重要的支撑。所以，我们对于江南文化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海派文化研究的一种“发生学”的探寻。从江南文化所包含的丰富文化“原点”中，我们可以把握海派文化之所以如此的本源性的原因，这无论是对于海派文化和海派文学研究的深入，还是对于江南文化自身研究的扩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再次，从江南文化本身来看。以江苏、浙江等地区为依托的江南文化，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本身，就蕴含了多重意义和价值。江南文化发源于远古时代的吴越文明，东晋时期的永嘉南渡是它开始形成独立文化形态的重要起点，此后的“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导致的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成为江南文化得以持续和积极发展的关键章节。明清之际，江南地区的工商业发展和外来经济势力的渗透，更为江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经济的保障和支持。近现代以来，江南地区一直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 cultural 强力，占据着中国社会的主流地位，江南文化也以其先进的地位和丰富的内涵成为中国社会步入现代化进

① 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程可资借鉴的重要样本。经历了远古、六朝、晚唐、晚明、清代等重要发展阶段的江南文化无异于一个巨大的意义包容器，它既有着远古吴越先民的“断发文身、好勇轻死”的刚硬之气，又有着六朝文人的移情山水、诗酒唱和的柔情雅趣；既有着南唐文人颓废、绮靡的花间酬唱，又有着明清大儒们务实、理性的苦心孤诣；既有着晚近江南学者们的革命和静守，又有着移民于十里洋场的江南文人们的摩登与乡土；……种种看似对立的意象都成为江南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标杆，它们所指向的“感性”与“理性”、“柔性”与“刚性”、“入世”与“出世”、“都市”与“乡镇”、“传统”与“现代”等诸多相互对应的范畴，也一再标示出了这一文化体系所包含的丰富而复杂的言说场域。显然，较之其他地域文化，江南文化体现出了更为多元的意义层级和更为丰厚的现代内涵，从某种程度上说，江南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它所体现出的诸多对立范畴，正代表了处在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社会的一个侧影和剖面，所以，对于它的深入研究，在当下中国社会现代性的探寻中，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

更重要的是，从江南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来看，这也是最初选择本论题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动力。屈指算来，从“五四”开始，有多少江南籍作家（这里主要是指江、浙籍作家）活跃在现代文坛上，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茅盾、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丰子恺、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施蛰存、穆时英、苏青……数量之大、巨星之多，是中国其他地区的作家们难以望其项背的。如此密集的作家齐集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短短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不得不让人瞩目于他们所共有的地域文化背景。这也是我们将现代作家置于江南文化语境中重加审视和阐释的重要前提。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现代江南作家在创作风貌和风格上呈现出的某些趋同的面目，又和江南文化发展史上诸多前辈文人的气质发生着某种程度的契合和呼应，这就使得这种从江南文化的角度对现代作家进行的研究和探讨变得更有必要。这种打通历史、贯通古今的思路，既符合了江南文化自身的成长周期，也为在江南文化语境中对现代文学的生态形成和现代作家的创作风貌进行的阐释，提供了富有历史感的依据。

而若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进程来看，当我们把目光下移到当代和当下文学的发展，众多江南籍的当代作家活跃于文坛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汪曾祺、苏童、叶兆言、曹文轩、余秋雨……他们的创作虽然因为当代社会的复杂语境而趋向于愈加驳杂，但在他们的某些创作中仍然流露出和现代江南作家，甚至是和几百年前的前朝江南文人相近的风神，这种“思接千载”的心有灵犀，只能归于古今文人、现代和当代作家相通的地域文化背景的奇妙孕化。

当然，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江南文化对于江南籍作家的影响和渗透中，我们看到了地域文化带给现代文学的某种较为特异的形态；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江南作家们所呈现出的各异风姿和文化品格，也正代表了江南文化在现代和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部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江南文化和现当代文学的关系是互动互补、相得益彰的。我们从江南文化的角度对现当代作家进行的阐释，一方面为这些作家的创作和现当代文学的诸种形态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维度；另一方面，这些作家们的创作也为江南文化在现当代社会的发展和更新提供了最佳的例证和依据。而这种互动的研究模式，也正落实了我们最初的文学和文化关系研究的既定目标。

二 研究综述

1. 地域文化和文学的研究综述

对于地域文化和文学关系的研究，在学界早已是一种形成共识的研究模式。

事实上，人们关注地域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1800年，法国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在她的《论文学》中就提出“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方”，而且还就两类文学的不同风格做出了描述：“北方的诗歌是想象的，令人沉思的、崇高伟大的诗歌；南方诗歌则是情绪的，追忆欢乐、耽于安逸的诗歌。”^①此后，法国的另一位批评家丹纳在他著名的《艺术哲学》中承续了斯达尔夫人的这一思路，并更加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于人性、文艺的重要濡染作用^②。

中国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则更为久远。《礼记·王制》中就记载了“王使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的做法，就是要通过各地诗歌的采集来体察各地的民风民情，说明上古时代人们就发现了诗歌和各地民风的联系，诗歌具有的地域文化特征。《诗经·国风》按照15个地区收集诗歌，生动地表现出各个文化区域的不同民情风貌，是将文学作地域性划分的先声。此后更多的典籍则从文学、语言、学术等诸多方面论述了不同的地理环境造成的各自迥异的文化风貌，比如《文心雕龙·宗经》称北方早出的《诗经》“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文心雕龙·辩骚》称南方后起的

① [法] 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151页。

② [法]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225页。

《楚辞》为“环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隋书·文学传序》称“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都较为鲜明的标识出南北方文学的差异性特征；《颜氏家训·言辞篇》则提出“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词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词多古语”，提出了文学语言的地域性问题；《世说新语·文学》、《隋书·儒林传序》则比较了南北方学术的不同：“北人学问渊弘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时至近代，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对南北方的地域差异造成的文学风貌的不同作了更为详细的辨析：“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①这些既往的论述都已明确表征出地域和文学之间确实存在的密切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金克木率先提出了“文艺的地域学研究”的设想，认为可以从文艺的地域分布、文体和风格流传的地理轨迹、某种文学艺术流派的地域定点研究和文艺的播散研究这几个方面来展开^②，奠定了文艺地域学最初的研究模式和基本路向。80年代末，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的“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一章，从先秦时期的《诗经》和《楚辞》一直梳理到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诗文，分别介绍了它们的地域文化特征及其表现，并认为：“中国文学一个时期地域性相当突出，另一个时期地域性又淡化下去而融入文学的民族特色之中，并为民族特色增加新的成分，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③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明确提出文学的地域性命题并加以学术性探讨的开始。在这之后，学界也出现了诸多探讨地域和文艺关系的著作，但大多较为集中在古代文学领域。比如王水照谈北宋洛阳文人集团和地域文化的关系、曾大兴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中对周秦到明清各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的统计和研究等，都较好地贯彻了传统地域文化和文学的研究思路，注重的是地域文化的传统内涵和文学之间的对应关系。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带有明确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对于这一领

① 郭绍虞、罗根泽：《中国历代文论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73页。

② 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读书》，1985年第4期。

③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0页。

域的涉足则甚为寥寥，只有在乡土文学研究和文学流派的研究中，会涉及到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的部分影响，比如严家炎在8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一书，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论者对于地域文化和现当代文学之间关系的初步思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出版，此举是地域文化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丛书的作者多为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中坚和新锐，其中包括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李怡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费振钟的《江南土风与江苏文学》、彭晓丰和舒建华的《“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刘洪涛的《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朱晓进的《“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逢增玉的《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李继凯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魏建和贾振勇的《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马丽华的《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等。严家炎在该丛书的《总序》中，对过去的地域文化研究作出了精辟的总结后指出，过去人们“对于地域的理解，注意力似乎过分集中在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条件上，而对构成人文环境的诸般因素则相对忽视”，在他看来，“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点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①对于“区域文化”的内涵，他也作出了一定的界定：“区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包括近百年来对外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新传统文化在内。”显然，他看到了以往研究对于地域文化过于窄化和封闭的界定，提出了“区域文化”这一概念，而且强调了“区域文化”伴随时代发展不断涌现新质的生长潜质和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他将“区域文化”和“20世纪中国文学”联系起来，提出了“用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新的学术路向，不仅为“地域与文艺”这一古老命题注入了新的学科内涵和时代意义，而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是一种思路和方法上

^①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江南土风与江苏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